

本报时评

八面来风

为青少年寻找暑假的正确打开方式

□ 三亚日报 吴采净



每一代人的暑假打开方式都大相径庭,对于这一代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们的假期多体验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人生多彩,若我们只让孩子取一瓢饮,不仅会限制了孩子的视野,也会苍白了他们的经历。引导青少年过一个有价值的暑期生活,是家长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

说起暑假,你会想到啥?是吃不完的美食、看不完的电影,还是挨不完的作业?每个青少年的想法都不同,自然,他们的暑假生活也就各不相同。暑假时间不短,对青少年的影响也颇大,因此,青少年如何过暑假,过什么样的暑假?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暑期过半,近日,记者走访发现,三亚不少社区引进专业社工,参与青少年暑期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

的活动体验。(据8月15日《三亚日报》)每到暑期,就有家长在朋友圈里吐槽:史诗级灾难大片《暑假来了》火热上演。不否认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真实地反映了一些家长对暑假的看法。睡懒觉、上网游戏、追剧……这是很多青少年暑期生活的概括。卸下了往日繁重的课业,他们终于借着暑假为自己的随心所欲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也正因此,一些家庭里常常传出家长的“河东狮吼”。由此看来,对于暑期,一些家长笑谈是“史诗级灾难大片”也未尝不无道理。

这些孩子也同样害怕暑假的到来。原本,假期应是放松娱乐、丰富课外知识的时间,然而长期以来的升学压力却让暑假偏离了本身含义。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暑期里给孩子报了一个又一个培训班,让孩子身心俱疲。重重压力之下,只能忍不住抱怨:我们还有暑假吗?

不管是在电子游戏,还是在一个又一个培训班中消耗掉暑期生活,这都不该是青少年暑假的正确打开方式,青少年的假期怎么过?这并非无关紧要,从中其实可以窥见青少年的兴趣、爱好、志向甚至是未来奋斗的目标。

因此,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暑期,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前,一篇《月薪三万,还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刷屏朋友圈,一位高管妈妈,月薪三万,可是她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买了,只因孩子暑假来了。几万都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这个妈妈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暑期生活,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每一代人的暑假打开方式都大相径庭,对于这一代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们的假期多体验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三亚不少社区引进专业社工,参与青少年暑期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动体验,就是给青少年过了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暑期生活。

人生多彩,若我们只让孩子取一瓢饮,不仅会限制了孩子的视野,也会苍白了他们的经历。引导青少年过一个有价值的暑期生活,是家长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

读者来信

“格斗孤儿”有没有更好的出路

□ 尼德罗

近期,多段“格斗孤儿”的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不但引发舆论热议,更直接推动了公安、民政部门介入调查。尽管官方调查结论还没出炉,但舆论对“格斗孤儿”所在恩波格斗俱乐部已经展开热议,有人斥责它将慈善做成生意,也有人赞赏它将生意做成慈善。

对此,专家们的观点更倾向于保护孩子的受教育权。例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就建议对贫困地区孩子的受教育状况、监护状况建立起社区层面的监督、跟踪、服务体系。然而,要在凉山这样的特殊贫困地区建立全面的监督、跟踪和服务体系,需要巨量人力物力,谈何容易?而恩波格斗俱乐部的“收养”行为,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那些孩子。

让孩子打拳,首先保证了孩子的营养摄入,这与他们在老家每天吃洋芋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在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中,14岁的小吾表示在恩波吃得好很多,即使被遣送回去,也会自己跑回来;其次,格斗训练给了孩子们融入社会的希望,对于许多凉山孩子来说,这是眼前少见的脱离贫困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恩波格斗俱乐部在“收养”孩子时,已经得到了监护人和凉山州官员的同意。这些孩子在来恩波之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已经处于事实失学的状态。在审视一项慈善行为时,我们绝不能只看当事人说了什么,更要看当事人做了什么。恩波本人从未标榜自己的“收养”行为是“慈善”,但在事实上,恩波给予了这些孩子急需的生存资料和成才途径,因此外界才会对这种做法作出“慈善”的解读。

所以,在对待恩波格斗俱乐部“收养”孤儿的行为时,固然要考虑孩子们的受教育权和有关法律,但最终要做的还是解决凉山孤儿救助的“老大难”问题,而不能制造新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恩波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表示俱乐部也找过几所附近的小学和初中,试图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但学校方面却认为,孩子们没有暂住证和居住证,文化成绩也不好,因此没有接受他们入学。如果这一表述准确,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安排这些孤儿就近入学,而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格斗俱乐部。

当然,凉山的孤儿总数超过2.5万,即便恩波没有任何问题,一个慈善组织可以解救的孩子也很少。这些孤儿最终值得仰仗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体系。成立于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目前已在五省120个行政试点村中设置了“儿童福利主任”岗位。国家的及时、全面介入非常重要,但这种一刀切、大规模的举动,也需要吸纳恩波这样个案的经验。在拯救孤儿的道路上,恩波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其经验应该被纳入考量之中。

多给制度缝隙“打补丁”

□ 贞元

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委等4部门联合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提升行动”,特别是启动了隐私保护专项行动,首批将对微信、淘宝等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隐私条款进行评审。

“隐私条款”对于许多普通人还比较陌生,然而在此之前一相关的新闻牵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今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之后,对网络运营者明确提出了明示所收集个人信息范围的要求。国内有互联网企业为做到合规,在其一款金融产品发布的新版用户服务合同中列出了其要搜集的个人信息,连户籍信息、社保参保状态、公积金缴费情况、通话记录等等敏感内容都被囊括其中。

这一事件,一方面暴露了过去许多互联网公司在搜集个人信息上不为人知的“行业惯例”,另一方面也让普通人猛然意识到自己在互联网时代所深陷的“透明人”处境。

我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行业搜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不可能避免的。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作为

“数据”被视为像石油一般的战略资源,大量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提供免费优质的服务,其商业逻辑也正是瞄准了这一资源。比方说,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越了解用户,它的风险控制能力就越强;一个互联网平台掌握越多运动轨迹、社交网络、消费习惯等个人信息,就越能精准推送广告、服务。因此,当用户已经离不开现代生活各种便利的智能应用时,也意味着让渡部分自己的个人信息成为必然的代价。

然而,当下最为紧要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个人信息可以被收集,哪些又是不能侵犯的禁区?根据《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必须经被收集者的同意。使用过APP的人都知道,如果在其启动页面弹出的服务协议及隐私政策上不去点击同意的话,就不可能使用其服务。但该举动的背后却有个“公开的秘密”:这些条款往往篇幅很长,表述很专业,用户几乎不可能在充分了解其含义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因而这种“同意”本身也就沦为了一种形式。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程度不能全凭企

业的良心,企业搜集的如果是一般个人信息或许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可是一旦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用户的利益将如何得到保障?

面对明确的立法要求,其中无法单一依靠市场自我调节的制度缝隙,就需要监管者及时“打补丁”。此次启动的隐私条款评审也是监管者发出的一个信号,通过对照法律要求评审隐私条款是否合规,监管者在用户接触相关网络产品和服务之前,就先为其个人信息保护把一道关,这表明法律落实所需的配套措施正在快步跟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还是一项在保护与利用之间反复寻找平衡点的监管探索。尽管法律对个人信息的搜集确立了个人同意原则、目的明确原则、“最少够用”原则等,但这些规定本身比较抽象、宽泛,在实践中还期待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标准。

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公共领域越来越热门的话题,只有更清晰的规则、更阳光的监督、更有力的监管,才能让处于信息弱势的普通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切莫上当

购买优惠加油卡的广大车友要小心了,国内网络诈骗举报平台——猎网平台近日监测到一种钓鱼网站和恶意APP组合冒充中石化加油卡网上营业厅的新型诈骗。

据安全专家介绍,这种新的钓鱼网站之前很少见。它先利用搜索引擎进行推广,借用较大幅度的优惠诱导用户下载安装假冒的加油卡充值手机客户端,再通过APP内的钓鱼网站诱导用户充值,以此骗取用户钱财。

新华社发

大家@说

别把父母当成自助“提款机”

背景:近日,浙江义乌一妈妈发帖称,她的女儿在杭州读大学,她每月给1200元伙食费,购物的费用另计,但读大学的女儿嫌少,表示同学的生活费是她的好几倍,并反问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中国青年报王彬:生活费这东西,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究竟给子女多少生活费算合适,并没有标准答案。这件事真正的讨论价值,恐怕在于女儿言论中体现出的扭曲价值观。年轻人希望多得到一些生活费,改善一下物质生活,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位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却依然只顾自己的物质享受,对父母没有最起码的尊重和体谅,把对父母的索取当成理所当然,只有埋怨,没有付出,俨然一副升级版“公主做

派”,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这样的年轻人感受不到人情冷暖,缺乏最起码的道德观念,只能建立起极端利己的扭曲价值观。现实中也有很多大学生会考虑到父母的不容易,以勤工俭学的形式一边补贴生活,一边磨砺自己,这便是学生主动解决生活困境的正面案例。其实只要两代人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费问题本不该是制造亲子冲突的源头,这件事应该为许多疏于子女教育的家庭敲响一记警钟。

人民网小蒋:许多中国家庭常常缺少应有的界限。具体表现是,父母觉得儿女永远是孩子,要为孩子包办各种事情,包括上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全额供给学费与生活费,毕业又帮着找工作,帮着买房买车,儿女找不到对象,父母成天上相相亲转悠,儿女生了第三代,又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负责带。一些成年儿女一方面觉得父母的所有钱物都该归儿女,享受父母的照顾心安理得,管父母要钱毫不脸红;另一方面又想获得“独立自

由”,对父母的说教与叨唠十分反感,可一遇到问题,还得回家找爸妈。说白了,这是父母与子女没有将对对方视为“独立的人”,在“爱”的名义下相互不设基本界限。必须指出,成年子女有成年子女的生活,成年子女要为自己的人生与选择负责,包括人格独立、行为独立、经济独立皆是如此。父母不是不可以帮衬成年子女,但不能像照料襁褓中的婴儿那样把成年儿女惯成“长不大的孩子”。就大学生生活费而言,即便父母有一定经济能力,也不是子女想要多少,父母就得给多少。父母在该给儿女“断奶”,让其自立时不能踌躇,儿女也别一边要自由一边要啃老。

医护人员当服务员?别急着抱怨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广东某三甲医院今年新入职医护人员,被“下放”到番禺某旅游度假区内当服务员,讲解动物、扫垃圾、端盘子,其中不少博士、硕士。(见8月14日《广州日报》)

经过多年培养的医学毕业生当起了服务员,此事引发极大关注,不乏反对与质疑的声音:“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我应该站在手术台前,不应该来这里干这种与医疗无关的事”“医生不是披着白袍的服务员”……

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和旅游度假区的服务人员在工作内容上的差异确实是八竿子打不着,但工作不同,不代表两种工作之间就没有相通之处。这些新入职的医护人员出生、成长的环境相对简单、顺利、舒适,而从学校走上社会,从教室走进医院,所要面对的问题往往复杂、繁琐、多变,处理事情时就需要更接地气的心态和更多元、全面的思考。从基层服务者面临的压力中成熟起来,从接受别人端过来的盘子转变角色到为别人端去盘子,这是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转变,这对将来在医院工作所需的抗压能力、沟通能力、随机应变能力来说,也是一种历练。

医院之所以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还让新入职医护人员去当服务员,目的就是让他们体验基层服务工作的酸甜苦辣,跳出专业角色重新认识医护人员的工作——患者不仅仅是患者,还是你的服务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服务游客的服务员,和服务患者的医护人员,在本质上都是为人民服务,医护人员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这种培训到底好不好,作为“过来人”的老员工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些曾经参加过同样培训的医护人员都认为这是一段既十分难得,同时又让人受益无穷的经历。现在,有些医护人员可能心有不满和抱怨,但当他们真正站在医护的职业岗位上时,会慢慢体会到当初学当服务员的价值与意义。

(工人日报 天歌)

让职工“带娃上班”值得推广

这个暑假,上海的2000多名职工实现了“带娃上班”的“小目标”。上海市总工会巡视员何惠娟介绍,职工亲子工作室在全市职工需求集中且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中,按照企业主导、工会牵头、社会参与原则,发挥单位优势开展职工子女晚托、暑托、寒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8月15日中国青年网)

开展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解决儿童的监管与教育之困,体现了对职工的人性化关怀,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值得点赞。

放假后,一些职工的孩子无人监管,更无人教育;特别是二胎政策放开后,越来越多的“二宝”的监管与学前教育问题让不少双职工家庭犯难。为了监管与教育孩子,一些女职工不得不选择辞职,这对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企业的人才培养都不利。如果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托育服务,不仅能够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为职工增加保障福利,而且能够鼓励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坚守职场,让女性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从而提升女性的地位。

事实上,托育服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分兴旺,也深受职工们欢迎。时下,对这种托育服务,一些教育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十分关注。如去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全国“两会”上曾提出建议,鼓励以社区为信托举办托儿所,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这说明,开展托育服务,是民心所向、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今,上海开展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为各地带了个好头。如果各地能够行动起来,则善莫大焉。

当然,要求各单位开展托育服务,举办托儿所,肯定存在不少困难,对于企业来说尤其如此。这就需要为此大开“绿灯”,比如,在办证、房屋设施、面积要求、周边交通等条件方面适当放宽,并纳入惠民办学的政策补贴范围;或者通过税收减免、教育费附加、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各单位特别是企业兴办托儿所;或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各社区兴办托儿所,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毕竟,孩子多一份安全,家庭就多一份安宁,社会就多一份和谐,从这个角度上讲,地方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理应承担起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

据国家卫计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国符合二胎政策的夫妇有9000多万对,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一些年轻家庭将陷入“生得起,养不起”的困局。这种“养不起”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无人监管与教育问题。对儿童的监管与教育问题不是小问题,也不单单是家庭问题,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安排,否则付出的成本与精力可能会很大。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市让职工“带娃上班”的做法,开了个好头,值得推广。

(燕晚晚报 吕政雨)

(本报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